

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做反修防修的自觉战士

(典型材料汇编)

工程兵政治部宣传部

一九七五年七月

目 录

让思想冲破牢笼

- 记红军战士甘祖昌与旧的传统观念作斗争
的事迹 (1)

坚决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(10)

一个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干部

- 记图们市人民武装部部长李承龙 (18)

老红军和他的扁担 (29)

革命战士 壮心不已

- 记邯郸军分区休干所离休干部陈飞 (33)

勇当破除旧观念的尖兵

- 记复员军人魏尧升退伍不回上海、立志务农的
事迹 (38)

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立志农村干革命

- 魏尧升同志的思想汇报 (47)

她没有下“战场”

- 记原志愿军某部护士长李春华回乡坚持继续革
命的事迹 (56)

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 (64)

革命后代的可贵精神 (69)

卢江天的申请报告 (74)

让思想冲破牢笼

——记红军战士甘祖昌与旧的传统
观念作斗争的事迹

编者按：甘祖昌同志是一位老红军战士，革命几十年，担任了部长。当他由于身体的原因而难以坚持原来的工作的时候，不是考虑怎样去“享福”，而是重新背起粪筐，拿起锄头，去当一个普通的农民。这种不为名，不为利，一心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贡献的思想品质，值得我们很好学习。

当前，大家都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，都在想，在议论：一个革命战士，一个共产党员，特别是一个领导干部，应当怎样加强学习，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

脑？应当怎样“让思想冲破牢笼”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，勇于摆脱各种旧传统观念的束缚，保持谦虚谨慎、艰苦奋斗的作风？应当怎样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？读了甘祖昌同志的事迹，会从中得到一些启发。

当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以后，对待上层建筑、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采取什么态度？这个严重的问题考验着每一个人：是真革命，还是假革命？是继续前进，还是向后倒退？

红军战士甘祖昌，用自己的行动作出了响亮的回答。他回乡务农十八年来，自觉地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，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作斗争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新的贡献。

“要做新社会的主人，不当旧观念的奴隶”

一九五七年三月，毛主席《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》中指出：“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。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，取得了基本胜利，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，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，还没有真正解决。”

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间，甘祖昌同志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。

甘祖昌原是新疆部队后勤部长。由于头部三次负重伤，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使他不能坚持原来的工作。甘祖昌谢绝了组织上的种种照顾，一再申请回乡务农。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后，他带着全家来到井冈山，回到了阔别三十年的家乡——江西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大队。

当部长的老红军回乡务农了，乡亲们热烈地欢迎他。但是，也有一些存在着旧意识的人们对此不能理解。回乡第一天，村子里出现了一些揣测和议论：

“祖昌叔是告老回家享清福的吧！”

“当了这么大的官，还当农民？”

听到这些议论，甘祖昌没有作更多解释。第二天，他到商店买回几只粪筐。第三天一清早，平常村里起得最早的老贫农李延恩，刚走出村头，在迷蒙的朝雾中看到：甘祖昌打双赤脚，黑布衫外面缠了根白腰带，背着个粪筐。他的几个孩子，也背着粪筐走在后面。湿淋淋的田埂上，留下了一串坚实的脚印。

一天又一天，甘祖昌越来越多地参加各种农业劳动。“祖昌叔真的当农民了！”村子里一些人的怀疑消除了，大家纷纷赞扬他，更加尊敬他。但是，甘祖昌的心情却不能平静。部长能不能种田，将军能不能为民？有人提出疑问，不正是给自己敲了响亮的警钟吗！

贫农出身的甘祖昌，清楚地记得，旧社会，剥削阶级正是用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等反动说教束缚劳动人民的思想，以便使劳苦大众永世受地主、土豪和贪官污吏的压榨。一九二七年五月的一个傍晚，一位党的地下工

作者到他家里传播革命真理，才使他冲破了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的精神牢笼，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“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；毫不奇怪，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。”回顾自己的经历，回顾党的历史，甘祖昌进一步认识到：不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，共产主义就不能胜利。一个革命者，要做新社会的主人，不当旧观念的奴隶。

从此，甘祖昌更加积极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。犁，耙，插秧，割禾，样样干。数九寒天，他照样脱下鞋袜，走下水田；三伏连秋，是最紧张的“双抢”季节，他总是迎着星星出，披着星星归。除因病休息和外出开会外，他几乎天天参加劳动。近几年虽然体力较弱，仍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。十几年来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由于甘祖昌和广大社员共同努力，沿背大队这个原来是山穷土瘦破房多的穷山沟，变成了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山村：渠水绕村旁，亩产翻一番，电灯明晃晃，新房连成片。社员们称赞说：“祖昌叔是我们队里改天换地的一员大功臣。”

一九六七年，根据甘祖昌的建议，大队办了个小水电站。甘祖昌亲自设计，亲自采购材料，从头到尾参加安装。电站建成了，除生产用电外，还能供一半社员家庭照明。社员们都主张先给甘祖昌家装电灯，他坚决不同意。后来发电量增加，社员都可以安装电灯了。社员大会作出决定：家庭照明一律装十五支光的灯泡。祖昌伯年老眼花，晚上学习不方便，给装六十支光的。甘祖昌又不同意。他说：“年纪大，受党的教育时间长，更不能特殊。”最后和大家一样装了十五支光的灯泡。甘祖昌就是这样关心社员群众比

关心自己为重，保持和发扬着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。

我们见到甘祖昌同志的时候，从他的住房上，从他的打扮上，从他那晒得黑黑的脸膛上，从他那粗壮有力的手上，看不到他与普通农民有什么区别。他握过枪的手又拿起了锄头，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前进，这是一场更加深刻的革命。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，甘祖昌站在斗争的前列。

“我们的责任，就是把下一代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”

在与传统观念决裂的斗争中，能否正确对待和教育自己的子女，这是一个现实的考验。甘祖昌同志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代，对自己的子女尤其严格。

早在一九五一年，新疆解放不久，甘祖昌的母亲把他的大儿子锦荣从家乡送到新疆，要他让锦荣上学读书，或者当个干部。甘祖昌想，儿子年纪不小了，应当参加劳动锻炼。他把锦荣送到铁工厂当了学徒。母亲知道后给甘祖昌写信，提出意见。甘祖昌回信说：“如果全国的人都不想种田、做工，我们吃的粮食，穿的衣服，用的东西，谁来生产呢？”这些话，打通了母亲的思想。后来，锦荣因为体质弱，学打铁有困难，甘祖昌把他送到农场劳动。一九五七年回乡务农时，又把锦荣带回农村当社员。

甘祖昌带领全家回到农村后，给每个子女发了劳动手册和生产工具，要求他们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，定期进行总结。红军战士甘祖昌，用这种革命家风，培养下一代从小养成热爱集体、热爱劳动的习惯。

甘祖昌经常讲，要把孩子真正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，就要破除旧的家庭观念。回乡以来，甘祖

昌同志把自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薪金用于发展集体生产，解决社员困难。有一位老人找到甘祖昌说：“你年纪大了，可也得为子女积蓄点吧。”甘祖昌笑了笑说：“从前辈那里继承遗产和特权，这是剥削阶级的观念，我们无产阶级留给后代的，只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。”

甘祖昌坚决反对滥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和利用熟人关系“走后门”的不正之风，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。现在，甘祖昌有三个子女在农村当社员，有两个当普通工人。有一次，甘祖昌的一个熟人劝他说：“你也该送几个孩子去上大学，当干部。给国家培养人材，我们也有责任嘛！”甘祖昌说：“我们老一辈革命者对培养后代是有责任的。这个责任，不在于是让他们当社员还是上大学、当干部。我们的责任，就是把下一代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”

“当旧世界的掘墓人，做新事物的促进派”

我们访问甘祖昌同志的时候，他正在认真学习理论。他说：“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是搞复辟、开倒车的反动派，我们共产党人，要当旧世界的掘墓人，做新事物的促进派。”甘祖昌就是一个这样的促进派。他对革命的新生事物，总是满腔热情、大力支持。

当红卫兵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，甘祖昌满怀深情地接待了许多前来访问他的革命小将，激动地给他们讲革命传统，勉励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奋勇前进。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，革命人民衷心欢迎，林彪反党集团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却跳出来攻击破坏。红军战士甘祖昌热情地扶持新生事

物，坚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。

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甘祖昌同志拍手叫好。他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给全国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的一封信，鼓励他们到广阔天地中去锻炼成长。公社农业科学研究所十多名回乡知识青年，有的不太安心在农村，想到城里找个工作。甘祖昌知道后，经常找他们谈心，耐心地帮助他们，通过批判孔老二的“学而优则仕”、刘少奇的“读书做官”、林彪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“等于变相劳改”等反动谬论，提高了知识青年们的路线觉悟。

沿背大队的合作医疗开办了。甘祖昌跑到公社、县城，买来药箱、药品和医疗器械，又到四十多里外的垦殖场挖来中草药，还给赤脚医生送了关于农村医疗的书籍。过了不久，村里传出了一股阴风，说什么“土包子当不了医生，中草药治不好毛病。”甘祖昌听到这话，立即和大队干部一起进行调查，原来是一个反动地主婆造的谣言。甘祖昌和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，在社员大会上批判了这个地主婆的反动言论。甘祖昌还带头请赤脚医生治病，用服草药治好了疾病的生动事实，宣传群众、驳斥敌人。为了巩固合作医疗，甘祖昌还把附近三个大队的赤脚医生组织到一起，学政治、学业务、交流经验。五年多来，沿背大队的合作医疗越办越好，不仅保证了社员身体健康，还采集了不少中草药材。

甘祖昌对社会主义无比热爱，对资本主义倾向坚决斗争。

一九六二年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刮起“三自一包”的妖风。一天，有人送给甘祖昌一份《百户调查》的材料，企图证明自留地收入“高于”集体收入。甘祖昌耐着性子看

完材料，他想，毛主席领导我们把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组织起来，走社会主义道路。现在有人要把集体的土地再分给一家一户，这是走回头路！晚上，甘祖昌戴上老花眼镜，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。第二天一早，他脚穿草鞋，肩背挎包到各地作调查去了。在半个多月时间内，甘祖昌翻山越岭，走村串户，重点调查了十个大队两条道路斗争的现状。他整理了两个大队的情况对比：富冲大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，由缺粮缺钱缺牛的穷队，变成了每年超额完成征购任务的先进生产队；而和富冲大队田靠田、村挨村的方陂大队，由于资本主义思想泛滥，把集体的田分给社员种席草，粮食连年减产，一年吃回销粮六万多斤。

甘祖昌带着材料，向县委汇报了调查经过，他说：“正反两面的事实说明一条真理：**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。**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！”这响铮铮的话语，表达了红军战士甘祖昌对社会主义的无比忠诚，也使在场的同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。

甘祖昌同志办事有个原则，符合社会主义的，坚决支持；对旧的传统习惯，坚决斗争。一天，有位邻居来找甘祖昌，说是有急用，要借点钱。甘祖昌把钱给了他，问他是什么用途。邻居说：“儿子订亲，要送彩礼。”甘祖昌当即说：“你把钱还给我，这钱不能借。”并耐心劝说他要移风易俗，破除四旧。有人议论说：“甘祖昌给了集体那么多钱，又不少钱用，左邻右舍的，为这点小事伤了情面，何必呢！”甘祖昌坚决反对这种旧思想、旧风俗。他说：“人民给我的钱，只能用来建设社会主义，不能用来搞四旧，这是个原则问题，不是小事。”

在伟大的批林批孔斗争中，甘祖昌更加朝气蓬勃地投

入战斗。他积极写大字报，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，反对复辟倒退。在大队民兵大会上，甘祖昌用亲身经历的事实，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。在访问中，我们看到，他的桌子上，放着许多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，笔记本里认真记录着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心得体会。他说：“我年纪不小了，但思想不能老。我决心象《国际歌》里号召的那样，让思想冲破牢笼。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，永远做一个红色的战士！”

（原载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五日《解放军报》）

坚决把革命工作做到底

红军团长、红安县柳林王大队
党支部书记 方和明

编者按：方和明同志这篇体会文章，建议同志们看一看。这对于我们怎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，怎样对待能上能下、能官能民的问题，是很有启发的。

把革命工作分成高低贵贱，等级森严，只能上不能下，只能官不能民，这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，是与我们共产党人一心为革命、一心为人民的精神不能相容的。我们每个同志应当象马克思、恩格斯教导我们的，**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**，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，奋勇前进。

过去一段时间里，我陆陆续续收到了一些同志的来信，要我谈谈自己是怎样能上能下的。说真心话，讲个人，是没得什么好讲的。讲几十年来党对我的教育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，我心里倒有好多话要说。

上去下来，都是为了革命

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：“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，这个问题要搞清楚。这个问题不搞清楚，就会变修正主义。要使全国知道。”共产党员应当怎样不断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，怎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贡献力量。是很值得思考的。

我已经是过了六十岁的人。现在算起来，参加革命四十多年，职务先后变动了十多次，有时上去，有时下来。这是很自然的事。党是根据革命的需要去安排每个人的工作的。今天需要你上去，明天可能又需要你下来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就应该坚决听从党的召唤，乐于到党需要的任何岗位上去。

一九三三年下半年，我入党不久，领导要调我一个独立营去当营长。当时才二十四岁，副排长还没当几天，连个讲话的队形都摆不好，这个营长怎样当？正当我在那里为难的时候，领导把我找去了，问我：“前面有个碉堡，上级叫你去拿下，你去不去？”我连忙回答：“去！”“敌人封锁严密，怎么办？”我回答：“想办法冲过去！”最后，领导对我说：“去吧，干干就会了。”我也明白了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对于党的决定，不应该皱眉头，有困难，努力想办法去克服。这样，我下了决心：干吧，是钢是铁，放在炉子里炼炼看！

当了三个月的营长，上级又调我到一個县去当指挥长，不久，又调我去当副团长。每当上级告诉我要调动的時候，我都叮咛自己，当这个“长”，那个“长”，并不是因为我方和明有多么大的本事，而是党需要我去做那項工作。职务只是革命的分工，我不能把职务当作官来做，而要当作革命的担子挑。

我也不斷地碰到过“下”的問題。一九三六年，我們那支紅軍隊伍調整編制，我由原来的作战科长改为当队列参谋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又调下去当连长、营长。全国胜利后，我又回乡当农民。从上头下来，我思想也不是没有斗争。当时，有人见我回到农村，手里没有提的，身后没有跟的，穿的是解放区的老粗布，便说：“走南闯北那多年，还是个光光的，莫不是犯了么错误吧？”听到这些，说不觉得刺耳，那不是心里话。但是，党组织支持我，贫下中农爱护我。当时农村党员很少，我每月步行十里路，到区里参加党的生活会。党组织听了我的思想汇报以后，对我说：“当了官再去当老百姓，这在旧的习惯势力面前是通不过的，你要拿出在战场上与敌人搏斗的气概，迎接旧东西的挑战。”一些过去与我一道扛长工的伙伴也跑到我的屋里，对我说：“老方，莫听那些闲话，当年你参加红军打江山，我们跟你戴红花；现在党叫你回乡，你不丢根底回来了，我们举双手欢迎你！”党组织的教育，贫下中农的期望，使我感到心里很热。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行动，能得到党的支持、人民群众的欢迎，有什么不光彩的？如果认为上去了就是进步，就光彩，下来了就是退步，不光彩，那是资产阶级思想。职务虽然有上有下，思想要天天向上，决不能让这些旧东西拖后腿。

有一次，一个富农分子在路上碰到我，拖腔拉调地问：“出去那么多年，没捞个官？”我一听，明白他是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向我挑衅，我两眼一瞪，回答道：“共产党员不是要做官，而是要革命！图官求名，是你们那个阶级的生性！”我没读过孔老二的书，可是听人说过，孔老二三日无官，心里惶惶不安。在剥削阶级看来，人出去要“远走高飞，成龙变虎”，回来要“衣锦还乡，光宗耀祖”。他们总是散布“官贵民贱”，“上尊下卑”的思想，腐蚀劳动人民，以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。我们是共产党员，上去下来，当“官”当民，为的是人民，图的是革命，这是我们的阶级本质和革命宗旨决定了的。

革命总是要与艰苦搭伴

要能上能下，能“官”能民，说到底还有一个能不能吃苦干革命的思想。我觉得，如何对待艰苦，也就成了能不能做到能上能下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
一九三七年，我由团的参谋长改为当连长，原来有马，这时没有马了。有的同志就跟我开玩笑说：“骑马的变成了步行的。”该怎么看？我想，当参谋长，上级配匹马，不是供你去享受的，而是要你利用骑马的条件，去更好地工作。为了工作的需要，说不定什么时候给你派个小车、派架飞机哩！但是，你如果是把这些东西当作生活用品去享受，那就错了。

毛主席经常教育我们每个党员要吃苦在前，艰苦奋斗。实际上不管干什么职务，都得有吃苦的思想。革命从来是与艰苦搭伴的。有了吃苦的思想，即使你担负较高的职务，条件再好，你也不会去贪图享受。相反，如果没有吃苦的

思想，就是让你到了最艰苦的地方，你也会偷闲。

全国胜利后我刚回到家里时，家乡还没土改。我的家被国民党反动派烧过两次，因此我回去住宿都困难。但是，人民解放了，我的心里是热的。我在赈上转了一下，站在富农王道兴的一块地里，想起好多往事。就是这个王道兴，我给他当了几年长工，出的是牛马力，吃的是猪狗食。有一天，我看见碗里有条虫，就用筷子扒出去。王道兴看见了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扔什么，这叫‘富贵虫’，是我家粮仓里长的，你家还没有地方长它呢！”我气得捏紧了拳头。想到这里，思想就爽朗多了。这些年来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都爱想一想，旧社会吃的是些什么苦，长征时期我们为什么吃苦。这顶管用，想一想，就感到现在的困难算不了什么。当时没有农具吧，我就把复员时上级给我的五百斤米卖了两百斤，买了一些农具，开始了耕田种地的生活。苦是苦一点，可是这个苦和旧社会含着眼泪走路的苦，性质不一样，味道不一样。今天，我们劳动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，生产条件不断改善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真是甜滋滋的。

过去人们往往都是讲苦尽甜来。依我看，苦中含有甜，就看你怎么个尝法。我在农村与泥巴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，可以说，天天在吃苦，也天天在尝甜。比方说吧，大前年，我们遇到了历年来最大的旱灾。为了把老天爷斗输，我们昼夜地守在水渠上，想方设法地搬水抗旱，要说苦，是吃了些。但是到了秋收时节，算盘一响，粮食又超《纲要》，当我们车拉肩挑地去送公粮的时候，那个心啊，不晓得有多甜！

心里装着革命大业，就看得远，想得开

这些年来，自己回到农村当农民，原来的同级和下级中不少人职务相继提升，有的成了领导干部。有人说：“老方革命四十多年，老在下面转，亏他想得开。”其实，事情很简单，只要心里装着革命大业，就能看得远，想得开。革命嘛，不是那一代人的事，后来者居上，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，大批优秀的新干部茁壮成长，正是毛主席领导我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的大好事。

一九五八年，我当农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兼主任。转人民公社时，我们社和高胜乡高级社合并为一个生产大队，上级决定由高胜乡社主任郑玉松同志当大队党支部书记。不久，郑玉松同志又提升为公社党委书记。这时，有人提议让我把大队党支部的担子挑起来。我就劝说这些同志，要为革命大业想得远些，让年青的同志出来接班，早挑担子早成熟。至于我自己，一定继续努力干，不任职务也尽责！上级采纳了我的意见，让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党员继任支部书记，叫我担任副支书。后来，在副支书的位置上，我先后和几个年青支书搭班工作。我常这么想，别人上去了，自己下来了，看来职务是后退了一步，但随着革命的发展，自己也在进步的行列中。在和年青干部相处中，我留心学习他们的长处，主动地请示、汇报工作。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，也尽力去帮助。还是拿郑玉松同志说吧，他当了公社书记后，谦虚谨慎，联系群众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我就鼓励他。他顾虑担子重，挑不起，我就对他说：“年青人，放开手脚干，有点错，不要怕，好生学习，再重来。”并把我过去的一些体会讲给他听。遇到难题，我